

中共當前意識形態面臨的危機

葉伯棠

(作者為本校東亞研究所兼任教授)

摘要

中共意識形態繼承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發展成爲毛澤東思想，此種思想依照「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強調階級鬭爭，並採取政治運動來控制中國大陸，結果發展成黨內鬭爭。

迨毛澤東死亡，鄧小平上臺，中共重新評估毛澤東思想，結果引起思想混亂，以後中共當權派鑑於大陸上經濟落後，實行開放政策，導致西方的文化進入大陸，影響發展，形成中共意識形態的危機。

前言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亡以後，華國鋒以代「總理」的身份，繼承其「中共黨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的職位，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他憑藉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一句話，以毛澤東繼承人自居，宣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引起元老派反感。一九七七年三月，鄧小平復職之後，企圖設法奪取華國鋒的領導權。他採取意識形態論戰方式，對毛澤東思想是否正確提出懷疑，引起評論毛澤東思想功過的問題，導致思想的混亂。

待鄧小平獲得政治局多數支持復出，他透過政治局的決議，逐步實行經濟改革。一九八一年七月，中共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並且「通過歷史問題決議案」，宣傳「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進一步導致意識形態危機。不久，鄧小平提出開放政策，以期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科技和人才，提高中國大陸經濟生產拓展外貿。結果反而使中國大陸人民發現中共的落後與貧

窮，對共產主義制度深感失望，產生「共產主義渺茫論」，以後又出現「理論無用論」和「社會主義異化論」，使中共意識形態面臨嚴重的危機。

壹、華鄧兩派權力鬭爭，採取意識形態方式

十八世紀是理性主義的時代，當時西洋思想家對人類充滿了希望，法國哲學家塔勒西 (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 使用意識形態 (ideology) 一詞闡述當時思想的理念，故有人視意識形態實為理念之學 (science of ideas)。意識形態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實代表中產階級反對封建時期的思想的一種武器。(註一)

馬克思 (Karl H. Marx, 1818-1883) 非常重視意識形態，他在研究德國思想家黑格爾 (Georg W.F. Hegel 1770-1830) 的著作時，發現德國都在「純粹精神的領域中打轉，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支配整個德國學術界」，因此，他認為：「要批判政治與現實問題，必然先要從黑格爾的哲學思想的批判開始。」(註二) 可見他是把意識形態作為批判的武器。以後，他發現黑格爾的辯證法，實為一種激發社會革命的武器，他遂運用辯證法推展歐洲革命。(註三) 他在研究德國文化與思想時，發現「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期都佔統治地位。」(註四) 換句話說，社會上盛行的思想都是代表統治階級的思想。(註五) 因此任何統治階級都重視思想，使社會羣衆產生共識，這是統治階級合法性 (legitimation) 的來源。

列寧 (Vladimir I. Lenin, 1870-1924) 在俄國從事革命時，正是西歐修正主義泛濫時期，列寧的暴力主張遂遭到阻擾。故他一方面提出職業革命家的理論，強調組織的重要；一方面重視意識形態，呼籲「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註六) 由此可知意識形態確是革命的原動力。(註七) 受了斯大林主義影響的毛澤東曾經說過，任何人想奪取政權，先搞意識形態。共產黨人深知意識形態的重要，非常重視「思想鬭爭」。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以後，對知識份子實施思想改造運動，要求知識份子放棄「資產階級世界觀」，接受「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以後發展「興無滅資」教育運動。(註八)

一九六〇年，中共大力宣揚「毛澤東思想」，要求全黨學習「毛澤東思想」。當時為了配合這一運動，中共出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強調「毛澤東同志關於敢於勝利，善於鬭爭的思想。」(註九) 中共中央要求「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

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反對形形色色的現代修正主義思想是我們當前的戰鬥任務。」（註一〇）爲了宣揚「毛澤東思想」，中共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後又發展到「四清運動」，最後終於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果形成黨內的大鬭爭，使中國人民遭逢空前的大浩劫。（註一一）

爲了表示繼承毛澤東思想自居，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華國鋒在中共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時強調，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貢獻，「就是完整地創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註一二）他指責四人幫最大的罪惡「就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註一三）今後路線鬥爭是「從思想理論上來說，就是圍繞着堅持還是篡改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註一四）華國鋒這種主張，除仍堅持繼續毛澤東思想的路線外，也暗示過去許多老幹部特別是鄧小平違反了毛澤東思想，導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因此，今後祇有堅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才不會犯錯誤。華國鋒這種論調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壓迫的老幹部非常不滿，採取反擊。

首先反對華國鋒論調的是中共元老陳雲。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在紀念毛澤東死亡一周年的文章中指出：「離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成爲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者，那麼，我們的革命工作就要陷於失敗，所以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際上是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誌之一。」（註一五）接着他引述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的一段話說：「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完全不是說熟讀它的一切公式和結論，拘守着這些公式和結論底每一字句。爲了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首先要學會怎樣把它的字句和實質區別清楚。」（註一六）基於這種理論，他指責林彪、「四人幫」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了極其瘋狂的歪曲、割裂、篡改和偽造，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片言隻語作法賣來到處壓人、害人、害黨、害國，他認爲這種作法嚴重地破壞了毛澤東的作風，搞的一套主觀唯心主義理論。

接着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六日，「解放軍報」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討伐幫八股」乙文，該文首先引用毛澤東批判王明路線的話，指責黨八股有八大罪狀，如造假、空喊、不講理、絕對化、影射攻擊、千篇一律，强奸民意和誘以名利。在這八項中，對思想最有影響的就是空喊口號和不講道理。文中指出四人幫寫文章、發指示、作報告，堆滿了空洞的抽象概念和時髦口號，既無需事實的根據，也不受客觀的實際檢驗。他們在報刊宣傳上，在政治生活中，不是實事求是作分析。呼籲：「幫八股藏

污納垢，窒息革命精神，束縛人們的思想。要掃除幫八股，樹立準確、鮮明、生動的馬克思主義文風，就要完整地準確地體驗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恢復和發揚我黨我軍實事求是，羣衆路線等優良傳統作風，切實按照唯物辯證法辦事。」（註一七）最後該文引用華國鋒在十一屆人大報告時的話說：「現在擺在我們全黨面前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新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進一步改造我們的學習，徹底肅清『四人幫』的影響和流毒，切實整頓好的作風。」（註一八）

華國鋒當然瞭解陳雲和「解放軍報」的言論，一九七八年三月，爲了安撫老幹部，華國鋒繼續批評「四人幫」的觀點，強調：「清算四人幫這場鬭爭確實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生死搏鬥，是一場歷史性的大決戰。鬭爭的中心問題，是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還是實行『四人幫』的修正主義路線。」（註一九）基於這種看法，他要求「徹底揭露『四人幫』修正主義路線」。因爲「四人幫」篡改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和科學社會主義，特別是篡改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接着他提出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至於如何實現，他仍然採取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的口號，就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方針。」（註二〇）這一方針就是毛澤東一再標榜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成爲「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的光輝典範。」

華國鋒這種主張雖然表示以繼承毛澤東思想路線自居，但顯然犯了兩項錯誤：首先，利用社會矛盾是共黨革命時期對敵鬭爭的一種策略，在共黨獲得權力以後，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不宜強調矛盾的觀念。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爲了開展反右派鬭爭，把矛盾分爲兩種，一是「人民內部矛盾」，一是「敵對性的矛盾」。前者是指共產黨內部的矛盾，採取和平手段解決，但結果卻發展爲「敵對性的矛盾」，造成「你死我活的鬭爭」，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次，華國鋒仍然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論調。過去這一路線反覆證明確已失敗，造成一個政治運動緊接着另一個政治運動地繼續發展。即使中共標榜的「農業學大寨」和「工業學大慶」也並不是成功的模式。更重要的是，華國鋒繼續堅持毛澤東的路線是正確的，那麼一九七六年四月爆發的天安門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是正確的，鄧小平就沒有理由復職。基於這種原因，鄧小平必然從意識形態中尋找理由，否定華國鋒的政策路線。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鄧派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該文說：「真理是否誤謬要經過實踐的檢驗，如果這項真理不能實踐，就不能算是真理。」（註二）「光明日報」為什麼要採取這種問題，因為毛澤東曾經說過：「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註二三）「光明日報」所採取的策略，就是利用毛澤東過去的觀點來否定華國鋒的論調，說明毛澤東思想路線是否正確，先要經過實踐檢驗。如果說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是正確的，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錯誤的，那標準是什麼？回答這個問題，就是祇有經過千百萬人社會的實踐。唯祇有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才能夠使假的科學、假的理論露出原形，從而捍衛真正的科學理論。「光明日報」的評論指出，有人主張以毛澤東思想去批判修正主義，但如果採取這種步驟，「只有結合大量的事實分析，才有說服力。不研究實踐經驗，不從實踐經驗出發，是不能最終駁倒修正主義的。」（註二三）「光明日報」終於指出：「客觀世界是不斷發展的，實踐是不斷發展的。新事物新問題層出不窮，這就需要在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指導下研究新事物、新問題，不斷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論推向前进，這些新的理論概括是否正確，由什麼來檢驗呢？只能用實踐來檢驗。」（註二四）這顯然等於否定毛澤東以前的思想能否適應當前的需要，看情況再定。作者特別引述毛澤東的話來否定毛澤東思想，「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註二五）

這篇評論最後指出：「四人幫」雖已摧毀，但「四人幫」對人的精神枷鎖並沒有消滅，「四人幫」設置的思想「禁區」並未觸及。這些話等於間接指責華國鋒仍然走「四人幫」路線。不能解決目前面臨的問題；尤其是現在實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面臨許多新問題研究，亟待解決。如果現在仍然「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的現成條文上，甚至令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註二六）這些話就是引用毛澤東的話否定華國鋒的觀點。

同年五月十三日，「光明日報」發表何祚庥的評論說：「人的思想是否符合於客觀實際，這從理論上是爭論不清楚的。解決爭論的辦法是回到實踐中去，實踐證明了人的思想是正確的，那就是正確的，否則就是錯誤的，或部分錯誤的。離開社會實踐來討論認識的正確性，就必然陷於經院哲學。」這是採取新的命題來否定華國鋒無產階級繼續革命論。

正當「光明日報」發表一系列的評論之際，同年五月底至六月初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鄧

小平對於實踐檢驗眞理提出了他的看法。他採取實用的觀點來說明，他說：「我們說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問題解決是不是正確，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夠理論聯繫實際，是否善於總結經驗，針對客觀現實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們只有這樣做了，才有可能正確地或者比較正確地解決問題，而這樣的解決問題，究竟是否正確或完全正確，還需要今後的實踐來檢驗。」（註二七）

鄧小平指出有人強調「凡是」觀點，卻忘記了實事求是的態度。他說：「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滔天大罪。」（註二八）這句話顯然是爲他過去的政策辯護。問題是過去鄧小平犯了修正主義的錯誤，如毛澤東還活在世上，他的判斷是否正確，祇有毛澤東自己知道，別人是無法解答這個問題的。現在毛澤東已經死了，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內涵見仁見智。但鄧小平認爲毛澤東在引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時，歷來是按照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講問題的，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活靈魂，就是具體地分析情況。馬列主義、毛澤東如果不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就沒有生命力。鄧小平的話祇是強調要靈活地適用毛澤東思想。

「光明日報」也隨着鄧小平的口氣而發表靈活地運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之論文。文中強調，馬克思主義只是提供一般的基本原則，對這些原則的應用必須考慮到實際生活。馬克思主義不是僵硬的教義，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但是，究竟基本原則是什麼，該報並沒有說明，唯它卻指出任何問題應從實際出發，分析新的歷史條件，提出新的問題、新的任務、新的方針。隨着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是建立在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之上，如果抹殺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必然「把馬列主義變爲僵死的公式和超越時間、空間的空洞概念，也就是抹殺馬克思主義的黨性和革命性。」（註二九）

基於上述，爲了反駁華國鋒以繼承毛澤東思想自居，鄧小平首先指出毛澤東不能解釋毛澤東思想，又以毛澤東其他的著作來否定華國鋒的主張，甚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反駁毛澤東思想。最後卻強調實事求是的作法，並注意靈活性來否認華國鋒繼承合法權力來源，結果使中共的意識形態進一步陷於混亂。

貳、先批判毛澤東思想，再否定文化革命

意識形態鬭爭雖然否定華國鋒繼承毛澤東思想的正統，但是鄧小平和老幹部過去所犯的錯誤並沒有平反。毛澤東在世時，「文革派」指責鄧小平掀起了「右傾翻案風」。現在鄧小平趁清算「四人幫」的機會，從事翻案的工作。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五中全會，劉少奇恢復原來名譽，文革派四大將汪東興、陳錫聯、吳德和紀奎被撤銷黨內一切的職務，這是翻案的開始。接着，鄧小平當權派指責「四人幫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要求人民發動羣衆，打贏這場戰爭。在揭發和批判「四人幫」的過程中，中共中央指責「四人幫」罪大惡極，不可寬恕，鄧小平當權派控制一切宣傳機構，當然可以批評「四人幫」，但是這種批評是屬於意識形態的領域，它的犯錯是屬於政治性。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共舉行公開審判「四人幫」的罪行，利用電視對整個大陸轉播，採取冤冤相報作法，暴露出了中共權力鬭爭的本質，使一般廣大的知識份子認清中共高階層爭權奪利的卑劣行徑。於是大陸知識份子憤慨地說：「搞政治鬭爭的人，誰的手不是骯髒的？」（註三〇）他們認為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祇是「個人之間爭權奪利的一場大混戰。」（註三一）決不是思想路線的鬭爭。

結果使大陸知識份子看穿搞政治運動達到控制人民的真面目之後，對中國共產黨產生無限的厭惡與失望，因為他們經歷了十年大動亂，耳聞目睹打着「革命」旗號的許多黑暗、醜惡，甚至是反動的東西，以及中共幹部貪污腐化，青年人感嘆說：「什麼事業、理想、什麼國家前途，共產主義一切都是假的。」（註三二）

一九八一年六月，鄧派經過長期策劃，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會中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新評價過去的歷史，把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鬭爭以後的歷次運動重作評論，尤其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作了徹底的翻案。

決議說：「『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也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註三三）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

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註三四）

「歷史問題決議案」可以說是對毛澤東思想總清算；但是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卻認為，批評毛澤東正是發揚毛澤東思想的真面目。這種說法不僅一般人民不瞭解毛澤東思想內容，即使中共幹部或領導人也無法說明毛澤東思想真正內容。（註三五）令人費解是決議說，毛澤東思想是中共「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集體智慧是指什麼人，是否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和鄧小平等人的思想呢？胡耀邦並沒有明白地指出，但他卻指出：「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就是要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就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註三六）究竟毛澤東思想的面目是什麼？不要說是一般人民不懂，就是知識份子和一般幹部也搞不清楚，故大陸青年發出感慨說：「昨天那樣說，今天這樣說，真理到底在那裏？昨天否定前天，今天否定明天，那麼明天呢？」（註三七）這種思想發展的結果，產生了「理論無用論」，因為「學習理論照樣會犯錯誤」（註三八）。更有些人對於中共歷史問題決議非常不瞭解，認為這是「有權則有理，權大則理多」的表現，在這種現象之下，中共的理論自然多變。中共自己也承認：「從理論多變到理論無用，又從理論無用發展成爲厭倦政治，冷淡理論，甚至動搖我們的信念，對未來失去信心。」（註三九）

參、中共提出解放思想，遂出現北京之春

當中國大陸知識青年認清中共權力鬭爭的真面目以後，自然地揚棄共產主義教條，必然反省中國共產黨加給人民的災難，一些知識份子利用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發揚民主解放思想」口號，出現爭民主的浪潮，大陸知識青年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口號。所謂「第五個現代化」就是民主化，他們指出，中國要實行現代化，首先必須實行民主，民主的社會制度是現代化的先決條件，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和前提，不但發展不可能，即使是保持現狀，也很難做到。（註四〇）這種言論立即受到

北平地區人民的歡迎，一時之間，北平出現了「北京之春」運動。由於這一運動迅速發展，民主運動人士直接向中共統治階級提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問題，他們說：

「中國社會制度的不民主，在過去三十年中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這已是當今人所共知的問題。面對這樣一個嚴重的事實，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是這樣兩種選擇：一、如果要社會向前發展，如果要生活和生產都迅速地發達，就必須改革社會制度；二、如果要延續毛澤東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民主可言，也實現不了人民生活和生產的現代化。現在的中國，正處在這樣一個沒有其他選擇餘地的三叉路口。」（註四二）

這種言論直接向中共統治階級挑釁，同時民主運動這一呼籲，使大陸知識青年紛紛提出反共的口號，於是北平地區出現了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不要共產主義領導等口號。（註四三）針對這一反共口號，中共不但提出了「四項堅持」的主張，（註四三）同時還主張加強學生思想教育，以期改變大學生的思想。思想教育的目的是「繼續大膽地鼓勵和引導在四項基本原則下去研究新情況，探索新問題」。這一研究其目的是揭露「資本主義制度腐朽性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註四四）中共「教育部長」蔣南翔針對大陸青年的反共思想，提出了加強和改進馬列主義理論的課程教育，（註四五）引起了大學生普遍的反感與抗拒，一時之間形成中國大陸思想渙散。中共報刊承認：中國大陸各種思潮洶湧，企圖擺脫中共控制，中共認為，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學校裏有時反映，學生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缺乏革命理想，滋長了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註四六）

爲了防止個人主義思想蔓延，除了中共「教育部」召開加強政治思想會議外，中共中央宣傳部也召開了一項「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以加強中共對思想戰線的領導，改變當前思想渙散的狀況。其實中共所提出的理由與作法並未產生具體的效果。鄧小平強調：「沒有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都需要改善，但不能搞自由化，搞無政府狀態。」（註四七）這種說法早已被民主運動人士所駁斥。他們指出，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宣傳人民羣衆或稱無產階級大眾當家作主，但是中國大陸的工人、農人，除了每月發給糊口的一點錢外，無盡地榨取人民的勞動力。因此他們一談到無產階級專政，認爲就是「俄羅斯式獨裁的變種」，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責問，「難道這樣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人民所需要的嗎？」（註四八）

從這些言論可知，中共當派深知思想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採取疏導方式，鄧小平主張重提過去宣傳，即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解決思想問題。唯他強調這種作法不能走老路子，就是不能搞運動，不能搞圍攻，即所謂「抓辮子」、「打棍子」、「戴帽子」、「搞殘酷鬭爭，無情打擊」的作法。換句話說，就是放棄暴力的作法。過去毛澤東整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搞階級鬭爭，採取暴力鎮壓的手段對付知識份子。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口號是搞階級鬭爭，實際上就是以暴力的手段對付異己，採取「你死我活的鬭爭」。現在鄧小平雖然提出加強思想教育，但又主張放棄暴力的作法，使知識份子的精神壓力與威脅減輕，間接等於鼓勵知識青年放言高論，這是導致現在中共思想危機的真正原因之一。

鄧小平所以提出不能搞運動也是有原因的，一九七九年他結合老幹部利用民主運動以奪取華國鋒的領導權，但是絕大多數的幹部仍然是由「文革派」所掌握，如果鄧派利用清除渙散思想，擴大成為政治運動，剛好給予「文革派」反擊鄧小平的機會，故中共當權派提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是不給「文革派」有反擊的機會，清除渙散思想，決不能捨去過去無中生有的作法，無限上綱，更不能圖報復，洩私憤，利用批評達到某種個人目的。現在主張批評要多講道理，「不但要指出錯誤在那裏，還要對錯誤產生的原因、環境和條件進行具體分析，使批評真正富有教育意義。」（註四九）

中共中央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方式改善思想問題，大陸人民就利用機會批評共黨教條，更引起思想上更大的危機，結果產生信仰危機。（註五〇）據鄧小平向幹部講話時透露，中國大陸盛行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言論。（註五一）思想危機表現在理論上，就是「共產主義渺茫論」。有人指出，共產主義渺茫像天上的月亮那樣可望而不可即，也有人認為現在是社會主義時期，應該談論社會主義理論，宣傳共產主義不現實。（註五二）也有人從實踐檢驗真理的觀點指出中共宣傳共產主義的理想也是不切實際，因為共產主義社會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過程，現在誇張共產主義的理想，祇不過是一種幻想。（註五三）也有人明白地指出：「共產主義哲學是未來哲學，為共產主義奮鬥僅是一隻遙遠的歌，難怪有人唱了半截就不唱了。」（註五四）

「共產主義渺茫論」反映了中國大陸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望，對共產主義的絕望。這是因為中共統治中國大陸，政運運動連續地推展，經濟衰退，人與人之間充滿了仇恨與猜疑，社會上彌漫了一股沮喪、不滿與失望的氣氛，中共報刊假話、大話、空話充塞，使人民對共產黨完全失去信心，是事實發展的必然。依照列寧的理論，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主義制度的第一階

段，現在一般人民對於社會主義制度如此失望，當然更不能對共產主義制度有所希望。隨着信仰危機，接着就產生信任危機，中共報刊說：「什麼叫『信任危機』呢？就是一部分青年同志看來，現在似乎沒有什麼可以相信的東西，他們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共產主義的黨輝前景都不相信。」（註五五）

形成信任危機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中共幹部的腐化與黨風不正。中共幹部不正之風，可以說是層出不窮，近年來中共中央利用自己控制的傳播媒體刊載幹部腐化現象，顯然與中共中央執行整黨整風有關，但卻無意中加速信任危機。一九八二年中央中央「書記處書記」王任重說，中共黨內盛行十種不正之風，所有社會不正之風都與中共幹部有關（註五六）。「人民日報」也承認：「應當說，主要的危險不是來自別的方面，而是來自我們黨內不堅定份子的蛻化變質。」（註五七）唯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認為如果這種情勢任其繼續發展下去，將出現「和平演變的危機」，即在和平的條件下，中共統治階級有衰亡的可能。為什麼產生衰亡的原因，因為大陸人民都追求經濟動機，換言之，他們都抱着「一切向錢看」的觀點嚮往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方式，必然否定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這就會出現「和平演變論」。

對中共思想衝擊最大的，應算「社會主義勞動異化論」。這種觀點是從馬克思異化的觀念發展而來，批評在共產主義制度下人民被剝削的狀況。大陸盛行的「異化論」也是指在中共統治下人民被奴役，經濟被剝削的事實。「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和過去曾經負責中共文藝工作的周揚對此都有論述，周揚說：

「在經濟建設中，由於我們沒有經驗，沒有認識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必然王國，過去就幹了不少蠢事，到頭來是我們自食其果，這就是經濟領域的異化。由於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會濫用人民賦與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領域的異化，或叫權力的異化。至於思想領域的異化，最典型的就個人崇拜，這和費爾巴哈批判宗教異化有某種相似之處。」（註五八）

周揚的論調當然不是代表他一個人的觀點，實在是大陸學術界共同的看法。他們都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異化」的現象。所謂「異化」，是馬克思提出的觀點，他採取哲學上的觀點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現在中國大陸知識份子以馬克思的觀念批判中共的統治，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法西斯的專政」。

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異化」在中國大陸表現尤為明顯，依照馬克思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勞動被資本家所剝削，勞動愈多，剝削也愈多，這就是「異化」。現在中共統治階級掌握了生產工具，計劃一切生產，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成國家資本主義。人民勞動的成果完全被共黨統治階級所剝削。魏京生提出質問說：

「解放後的幾十年中人民勒緊腰帶，拼命的幹，也確實創造許多的財富，這些財富都到那去了？有人說，拿去餵肥了像越南這樣的較小型號的獨裁政權；有人說餵肥了林彪、江青這樣的『新生資產階級份子』；這都對，總而言之，它沒落到中國勞動人民的手裏，這些財富不是被大大小小的手中有權的『一類政治騙子』直接揮霍了，就是被他們賞賜給了越南、阿爾巴尼亞這類與他們志同道合的混蛋們。」（註五九）

這種論調透露了中共奴役人民的事實，最引起人民不滿的是中共統治階級不但剝削大陸人民的生產成果，而且還把人民的生產成果轉為對外援助，以建立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維持中共統治階級的存在。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異化的主要原因是官僚主義，它是「權力異化」的主要來源。中國大陸由官僚階級所統治，結果使「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主人，政府變成了老爺，不受人民控制了，變成異己的力量，亦認為這種異化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產物。」（註六〇）這種理論與南斯拉夫吉拉斯的「新階級」的理論可謂異曲同工。

肆、反駁社會主義異化論，再批判資本論

中共統治階級認為，社會主義出現「異化論」，是大家對社會主義經濟改革認識不清，故要加強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歷史研究，使知識份子瞭解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中共報刊承認，過去社會主義社會理論研究的缺點是未能深入，使社會主義建設受到嚴重的挫折。（註六一）何煉成說：「形成挫折的原因，是對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的發展無法瞭解，結果出現『窮過渡』，飈共產主義風的論調。（註六二）」

這種說法掩飾事實真相，難以令人信服。毛澤東提倡「以階級鬥爭為綱」，以政治運動為手段，達成經濟上的目標，結果造成經濟大衰退。現在針對過去失敗的教訓，提出「衡量生產關係好壞的唯一標準，是它能否最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基

於這一原則，他們指出當前中國大陸生產力發展極不平衡，祇有採取多元多層次的所有制結構，「不但要鞏固和發展全民所有制，以適應社會化的生產力的要求，而且要大力發展集體所有制，以適應城鄉特別是農村比較低下的生產力的要求，同時應允許一部分個體所有制的存在，以適應城鄉一部分落後和分散的生產力的狀況。」（註六三）這是中共經濟政策重大的改變，但在理論上並未配合，又導致思想的混亂。

也基於這一原因，有些學者承認中共政治經濟學教學必須改進，因為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內容仍然停留在五十年代的理論。中共經濟學家于光遠承認：「直到現在，一部比較令人滿意的、系統地、全面地論述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專著，還沒有寫出來。」（註六四）他們認為，在編寫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教材方面，應該參考西方國家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成果，以瞭解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和社會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性，以及解決經濟問題的運作過程列入教材內。他們強調：「爲了研究社會主義國家對外經濟關係中的客觀規律性，我們就不得不考慮資本主義，而且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的規律性，不得不去考慮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對外經濟關係中的客觀規律性。」（註六五）有些學者指出，中共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內容仍侷限於一百多年前的理論，必須加以改變。其理由是：一、現在生產力高度發展；二、出現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制度；三、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也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政治經濟學仍然停留在馬克思時代的批評資本主義的觀念，顯然是無法適應新的歷史條件。（註六六）特別是過去對資本主義沒有深入研究，無法瞭解資本主義制度的運動，結果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評犯了嚴重的錯誤。再說對社會主義制度來說，不研究生產力，祇強調生產關係，結果強迫生產力適應生產關係，才犯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錯誤。

從中共經濟學家對政治經濟學家的批評，可以證明中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已經混亂。對共產黨人來說，理論應該是指導政策，現在政治理論出現嚴重問題，必然影響政策之執行，這是中共目前面臨的困境。理論問題又集中對「資本論」的批評。馬克思「資本論」是中共黨校重要教材之一，希望以「資本論」解決中共經濟問題，中共召開無數次會議，爭論甚多尚無結論。（註六七）一般而言，中共理論教科書一貫把「資本論」看成是真理，既然是真理，任何人都不能反對。但有些學者不同意這一看法，黑龍江大學講師熊映梧認爲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是時代的產物，「資本論」也不例外。「它是特定的時代產物，也不

可避免有其歷史局限性」。依照他的看法，任何思想都是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的時間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他所討論的是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今天是二十世紀的時代，馬克思預料資本主義制度將有重大的改變，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評論當然無法適應於今天。（註六八）特別是出現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馬克思根本沒有提過。依照馬克思的觀點，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商品貨幣關係。依照熊映梧的看法，中共中央開放經濟制度改革的決定，要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執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馬克思沒有料想到的，馬克思當然無法解決此一問題。再說，按照辯證法的觀點，如果說「資本論」是永恒真理的化身，那麼馬克思的辯證法也無法存在。對於社會主義所有制，馬克思祇是籠統地提到社會佔有生產資料所有。以後斯大林區分了「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中共又確定全民所有制可以且有多種形式，集體所有制也可具有多種形式。他認為「在不發達社會主義階級，在社會主義經濟佔主導地位的前提下，應當允許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一定範圍內存在和發展。顯然，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重大發展。」（註六九）熊映梧強調：「馬克思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他的歷史責任是批判舊世界，因而他的理論體系自然地測重於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證明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註七〇）既然「資本論」的功能是批判的，它如何作爲社會主義建設指導原則？

熊映梧指出，中共從事理論研究者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不是採取實事求是的分析，祇「試圖從什麼『貧窮』與『貧困』有區別的說法，尋找一條維護『貧困化理論』的出路。」（註七一）因此，中國大陸學者批評這種作法顯然不是研究者應有的態度。討論中共經濟理論，南京大學講師宋龍祥以「馬丁」爲筆名，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日「工人日報」發表論文，直接批評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共的經濟理論。宋龍祥的論文首先從政治經濟學適用的觀點來討論，他與熊映梧看法一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的目的，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交換關係和分配關係，揭示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衰亡的客觀經濟運動規律，論證社會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衝突的必然結果。」（註七二）他並認爲，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面臨的任務不再是批判舊的資本主義世界，而是面臨着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把研究的重心，放在發展社會生產力和增加國民財富上，放在經濟的穩定、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上，放在如何使社會主義經濟順利地運行上。但要達成這些任務，在「資本論」中是找不到現成的答案的，因爲馬克思從未陷入對未來社會的烏托邦式的幻想，他僅從

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出發，對社會主義社會作了最一般、作抽象的預見。換言之，馬克思的著作無法解決中國大陸經濟問題。這也與熊映梧所說是馬克思思想「有歷史的局限性」，這種論調等於是直接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性，不能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原則。

宋龍祥又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決不是意識形態，「它不應該像意識形態那樣，簡單地、直接地成為現行經濟政策的附庸、傳聲筒和論證工具」。他指出，中共過去所宣傳的實際上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一種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他說：「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學家只滿足於對現行經濟政策加以注釋、闡述和論證，一味地為經濟政策唱頌歌，而很少對它們進行思考、挑剔、批評乃至科學分析……事實證明，經濟學家僅僅滿足於闡述和論證現行的經濟政策，這既不利於經濟科學自身的發展，更會給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帶來巨大的損失。」（註七三）

熊映梧主張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應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作具體的分析，不可持全盤否定的態度，因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仍然有其合理之處以及可取的價值。他強調：「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不僅批判地吸收了古典經濟學的優秀思想成果，而且肯定了其中合理的和有價值的因素，決不是全盤否定。他指出，過去全盤否定資本主義是犯了極嚴重的錯誤。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與研究，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繁榮是不可抹殺的。」（註七四）故他呼籲「科學地批判、分析、借鑒西方經濟學成果」，對中共的經濟建設理論有「現實的意義」。宋龍祥接着又指出不容忽視西方經濟學家的成果，他認為，凱恩斯的總體分析方法以及通過擴張性財政金融政策促使流通和消費對生產發生積極反作用的理論，新劍橋學派對收入分配同經濟增長之間相互關係的研究，新古典綜合派強調總體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相結合以及強調國家干預經濟活動，同時又注意利用市場機制調節作用的思想，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市場機制和國家過分干預經濟造成的弊病的分析，計量經濟學的投入產出法、線性規劃和其他經濟計量方法，發展經濟學對不發達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分析，比較經濟學對不同國家的經濟制度、經濟模式和經濟政策的分析比較，人口經濟學在研究人口、就業和生產力水平三者關係基礎上提出的適度人口理論，新制度經濟學對資本主義二元經濟體系（市場體系和計劃體系）的批判分析，都應列入研究，才能作出客觀的結論。

對於當前中共提出「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實行工農年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他認為這個口號容易「陷入經

濟唯物主義的泥淖」，因為社會是由多種複雜的系統所形成，其間各種因素相互依存牽制，過分重視生產總價，很容易重蹈「技術決定論的覆轍」。如果提高國民經濟生產總值，就要考慮有助於提高經濟發展的其他因素，尤其是「現代的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使社會整體共同向前發展。」他提醒經濟學家在研究經濟問題時，必須掌握理論、各國經濟發展史和統計學。他呼籲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家，「僅具備一定的理論知識不足以分析和把握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還必須具備一定的歷史學和統學的知識。」（註七五）他坦誠地指出，「中國大陸經濟學家的知識結構處於嚴重的失衡狀態，許多經濟學家基本具備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知識，但卻缺乏歷史學和統計學方面的知識。」（註七六）其結果暴露了中共對經濟實際的運作缺乏知識，無法準確地瞭解中國大陸經濟實際的情況。但如何改變目前中國大陸畸形知識的結構？這個問題又牽涉到中共經濟學教育的問題，因爲此一問題牽涉到「三十多年來一直未變的畸形課程結構的傳統影響，而且現在一代經濟學家畸形知識結構通過教學和科研的中介強有力地遺傳給未來經濟學家。因此，不改變我國目前一代經濟學家的畸形知識結構，不改變我國目前經濟學教學中的畸形課程結構，我們就不可能培養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國經濟學家，我們未來的經濟學家也就無法擔負起時代賦予的歷史責任。」（註七七）

宋龍祥的這篇文章所提出的問題，遠遠超出了政治經濟學的範圍，可以說是對中共政治經濟的理論徹底的批判。他指出馬克思經濟思想不能作建設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中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根本無法適應當前經濟建設的需要，他建議中共負責經濟計劃者，應採取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理論，特別是運用計量經濟學的理論，才能瞭解經濟實際的運作，有助於解決中國大陸的經濟困境。

伍、政治思想教育失敗，馬克思主義受揚棄

由於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教育政策紛紛提出意見，甚至把中共的經濟失敗責任歸咎於中共經濟學教育的內容，應採取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來解決中國大陸所面臨的經濟危機，更加深了中共思想面臨的危機。中共不但不接受這種觀點，反而主張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以解決大陸思想上的危機。代表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說：

「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在學校教育中佔有特殊重要地位。它是整個的教育的靈魂，是黨在學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社會主義區別資本主義學校的重要標誌，這就像四項堅持原則表示我們國家的性質一樣。這種作用，是任何其他課程不能取代的。它決定我們學校教育的政治方向，也決定我們境界出來的學生政治方向，所以，這樣的課程在我們各級學校裏應當屬於重要的地位。」（註七八）

依照中共中央的呼籲，在北平以知識份子為發行對象的「光明日報」特別召開一項座談會，討論如何加強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與會人士對於如何改革馬列主義的教學並未提出具體解決的辦法，但卻透露了執教這一課程的困難，即「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教學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註七九）也就是說，理論聯繫實際上發生了困難。

唯如何使教學與實際發生聯繫？各學校政策不同，以北京大學為例，該校對於馬克思教育改革，方案的就是開設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和當代資本主義，當代政治與國際關係、當代西方思潮評介等課程。這些課程分必修與選修，開設這些課程的目的不是客觀瞭解當代西方思潮的發展，而是且有意識形態的作用，也就是「要結合近現代的經濟史、政治史、思想史，講述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產生，豐富和發展它，並用來分析當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幫助學生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樹立共產主義的思想和信念。」（註八〇）

北京大學增設這些課程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雖能滿足大學生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嚮往，卻引起北京大學的學生對西方新思潮的興起，他們非常喜歡閱讀新馬克思（Neo-marist theories）主義，法蘭克福派（Frankfurt School）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特別是新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浪潮（third wave）對中國大陸產生深遠的影響。也由於各大學開設西方政治制度課程，有些刊物介紹西方思想，如北京出版的讀書雜誌，採取對話的方式，藉介紹資本主義理論來批評社會主義，特別針對中共的理論與實踐作徹底的批判。（註八一）

由於學術揚棄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迫使中共不得不採取間接的方法表示，中共的社會主義建設在馬克思的經典中是無法找到的，祇好自己摸索。中共馬克思主義學者說：「可是，中國的建設卻沒有這樣具體理論，在先行進入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實踐中也沒有完全成功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建設究竟怎麼搞。全靠中國共產黨人自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特別是

它的最一般的方法論原則，去進行獨立的探索。」（註八二）「人民日報」特別發表評論說：該報說：

「馬克思逝世已經一百零一年了，他的著作是一百多年前寫的，有的是當時設想的，後來情況起了很大的變化，有的設想不一定妥當。很多事情，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經歷過，列寧也沒有經歷過，他們沒有接觸過到，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的問題。」（註八三）

這一篇評論雖為中共的政策辯護，卻等於宣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過時論，既然如此那麼學習馬克思原理，沿着馬克思主義道路這些類似的口號都變成毫無意義，這又進一步證實中共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解釋面臨困境，也使從事理論工作的人的處境非常狼狽。

思想混亂的結果，也連帶地使人生價值的觀念發生改變。有一段時期大陸上流行的口號是：「五十年代人幫人」、「六十年代人鬪人」、「七十年代各人顧各人」。現在由於中共政治宣傳失敗，大陸上又盛行另一種口號，即「五十年代靠理想，六十年代靠榜樣（雷鋒）、七十年代靠崇拜（個人迷信）、八十年代靠銀兩。」（註八四）甚至有人認為，「改革就是放棄社會主義，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的說法。」（註八五）這就是盛行「一切向錢看」的心態。

真正促使大陸知識份子不滿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共的經濟政策。因為大陸的落後與貧窮，鄧小平為主的當權派檢討過去政策的錯誤，又參照東歐國家改革的經驗，決定擴大企業自主權，採取所謂「放開」、「搞活」與「鬆綁」的政策，給予人們部分自由追求利潤，這是中共最近倡導商品經濟的原因。最近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表示，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就是「求利」，這與「一切向錢看」沒有兩樣。

事實上，「一切向錢看」並非壞事，如果大家都追求利潤，社會財富必然相對地增加。但是中共又怕這種心態，揚棄共黨教條，也使中共集權控制受到影響，遂指責這種心理是片面強調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眼前利益，不顧「國家」計劃和人民的需要。這種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如果一般人單純地追求個人直接的金錢收入，不一定與發展集體福利、社會公共事業同個人物質利益對立起來。但中共卻無中生有，批評「一切向錢看」的心態。中共報刊宣稱採取「一切向錢看」來刺激所謂「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真正動力。其實，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任何個人或團體的經濟活動，當然是為

追求自己的利潤，不能顧及國家的利益，國家的利益是由國家負責經濟責任的人去計劃，至於其他人民的問題，更不可能顧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計劃與經濟活動的方式，一個人從事經濟活動，決不可能顧及其他人的利益。「一切向錢看」是個人或集體活動的基本方針，也是經濟活動的動力，但決不能說就與國家和集團對立起來。因為它是依照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充分發揮人民的創造力，也就是說祇有個人的經濟活動給予充分的利潤報酬，才能「鼓足幹勁」，否則將像過去一樣地祇要求人民無限地為共產主義的理想奉獻，結果變成虛無深淵的幻想。

「一切向錢看」雖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人民創造經濟的動力，但並不是唯一的動力。資本主義制度所以能夠日趨繁榮，尚有其他體系互相配合。在社會學上過去講求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是一種自由競爭理論的根據。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出現了結構功能主義，在政治上，講求民主、法治，在經濟與政治的決策上，都是透過人民代表制訂的法律來實現，人民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從事經濟活動，在經濟上講求企業管理和企業精神。但是中共缺乏這些條件，在「搞活」與「鬆綁」政策之下，幹部先受其惠，現在中共宣傳機關批評「一切向錢看」心態所犯的弊端，完全是幹部利用職權破壞中共的政策，即「以權謀私」。幹部所以形成如此的現象，主要的原因是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幹部已經成為「官僚統治階級」，祇要這一階級繼續存在，一切不正之風都由此而起。因此，今天中共要想徹底解決不正之風，必須從根本上改革幹部制度，中共不圖正本清源，反而批評一般人民，真是無的放矢。

陸、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人民一切向錢看

中共報刊批評一般人「一切向錢看」的心態，但又提倡商品經濟，這也是導致思想混亂原因之一。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說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時，等於為「一切向錢看」辯護，他說：「城市經濟改革使工商企業和其他企業，逐步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使企業單位有了一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和相應的經濟利益，結果逐步走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同時中共為了配合城市經濟改革，採取商品貨幣形態、市場調節，以及企業之間競爭的擴大，使價值規律在城市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

經營成功的條件是講求效率逐步增加。越大的衝擊，價值觀念、市場觀念、時間觀念、效率觀念、人才觀念和信息觀念等新觀念，逐步出現。如果企業率和市場，也就是多獲得報酬和利潤（註八六），這就是「一切向錢看」。但是中共卻批評「一切向錢看」，指責這種心態是資產階級的思潮，這是理論與事實的差距。

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馬洪並沒有明白的解釋，祇說：「樹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新理念，仍然是我們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如何透過思想政治教育認識商品經濟，他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固然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是支配它的運動規律，仍然是包括價值規律在內的商品經濟通行的規律。因此，商品經濟固有的盲目性、自發性等帶來的消極因素仍然存在。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計劃性以及商品範圍的有限性，只是給克服這種盲目性和自發性等消極因素提供了可能性，而要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需要有科學的計劃基礎，強大的宏觀間接控制能力，完善而靈活的調節機制，高水平的管理人才等等。而這些在短時間內是難以完全具備的，因此，商品經濟的盲目性和自發性帶來的消極因素，就會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反覆出現，弄得不好，甚至還會泛濫起來。」（註八七）

事實上，製造困境和破壞商品經濟不是廣大的人民，而是各級幹部。馬洪說：「但是不容迴避的是，現在不但各級管理企業的國家機關不少都在經營自己的供銷公司，為本單位謀取經濟利益，有的行政管理機關也規定可以從查處違法案件的罰款中取得百分之幾十的分成，作為本單位職工的額外收入。至於利用職權，向企業索取回扣、接受賄賂等，更相當普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侵入黨和國家政權機關的政治生活，已經是一個嚴峻的事實。如果我們再不重視，再不徹底糾正這種不正之風，實現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將是很困難的，我們的國家政權機關現存的一些腐敗現象也無法徹底克服。」他又說：「我們的黨政機關面對着這種的情況，同樣一個領導幹部，一方面是共產黨員……他們在頻繁的經濟活動中，為了部門的、地區的、企業的利益，有的為了自身的利益，有時就把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的一般原則引進政治中來。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往往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註八八）

至於萬里的說法又是另一回事，他把中共統治造成的社會風氣敗壞歸咎於數千年封建文化傳統的影響，「至今這種遺毒仍然到處泛濫，在不知不覺之中支配着人們的是非標準和道德觀念。」（註八九）萬里的這種說法，並非為中共的政策而辯護，反而

證明中共過去的教育失敗。他又把現在大陸上的思想是受到「半殖民地社會歷史條件而生的奴化思想、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同封建腐朽思想相配合。」萬里這種說法，進一步地證明社會上盛行的思想與統治階級的思想發生衝突。從馬克思的觀點來看，這就是統治階級出現的統治危機，唯他也承認過去中共在思想上犯了錯誤，他說：

「過去不適當地強調批資批修，『割資本主義尾巴』，實際上把僵化的模式強加給農民，批了農民的積極性創造化，

批了商品經濟，結果就是排斥商品經濟，阻礙向商品經濟轉化。」（註九〇）

從萬里的話證實，中共執行共黨理論教條錯誤，使經濟遭到挫折，引起人民的反抗，也導致意識形態的混亂。

結論

基於上述，中共思想混亂，起因於黨內權力鬭爭，鄧小平爲了使自己翻案，運用意識形態來表達，他利用黨代表大會的決議，重評中共黨史，結果使意識形態陷於混亂。大陸知識青年遂利用機會，提出「解放思想，發揚民主」的口號，要求實行第
五個現代化，一時間出現了短暫的「北京之春」，其影響結果，大陸上盛行「共產主義渺茫論」、「社會主義異化論」等口號。
。而隨著中共的對外開放，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清算過去錯誤的理論，放棄了「
以階級鬭爭爲綱」的理論，但仍無法建立一套新的社會主義理論。反之，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與文化和價值的觀念不斷地傳入
中國大陸，迫使中共提出相對的改革。然而真正的關鍵是在政治是否民主和人民是否真正自由，如果改革不從這方面着手，那麼一切的改革都是徒勞的，唯從最近中共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又無法實現真正的改革，導致中國大陸學生提出要民主爭
自由的口號，衝擊著中共統治的基礎，如果中共不作徹底的變革，仍然堅持「四項原則」，將必然引起中國大陸人民更大的反
抗，對中共的統治構成嚴重的威脅。

附註

註 1.. Martin Seliger, *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Ideology: A Critical Essa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7-15.

註 11.. Sidney Hook, *Hegel to Marx: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8), pp. 17-25.

註 二：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0), pp. 99-108.

註 四：Nicholas Abercrombie and als,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0), p. 7.

註 五：*Idid.*

註 六：列寧，「做什麼」，列寧兩選集（莫斯科，外國語文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卷上，頁一九六。

註 七：Nicholas Abercrombie 等教授指出，在歷史上自封建主義到後資本主義，每一個階段，却盛行一種意識型態，這是共識的基礎，也是權力合法化的基礎。見同註四。

註 八：一九六三年中共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主要的目的就是「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見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Bill Brugger, *China: Radicalism to Revisionism, 1962-1979* (London: Croom Helm, 1981), pp. 23-27.

註 九：林彪，「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

註一〇：同上。

註一一：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起，「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齊與其妻名義，在香港大公報發表「中國文革十年」長達兩月之久，描述，中國歷史上空前浩劫的經過。

註一二：華國鋒政治報告，見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註一三：同上。

註一四：同上。

註一五：陳雲，「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註一六：同上。

註一七：解放軍報，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六日。

註一八：同上。

註一九：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三月七日。

註二〇：這一口號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提出。屬於最重要的政治運動口號之一。

註二一：光明日報，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

註二二：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卷二，頁二八三。

註二三：光明日報，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

註二四：同上。

註二五：同上。

註二六：光明日報，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

註二七：董孟華，「青年的感嘆和洛倫茲的悔恨」，社會科學（月刊）（上海），一九八三年十月，頁五四。

註二八：歐力同，「人手皆憊」，社會科學（月刊），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頁三三。

註二九：王之璋「談看穿」，社會科學（月刊），一九八三年一月，頁五七。

註三〇：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

註三一：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

註三二：胡耀邦，「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講話」，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

註三三：胡耀邦，「馬克思主義偉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們前進」，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

註三四：白玉，「『理論無用』析」，社會科學月刊，一九八二年七月，頁十六。

註三四〇：魏金生，「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大陸地下刊物彙編，（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民國六十九年），輯二，頁九。

註四五：「要民主道是要新獨裁」同上，輯一，頁二十五。

註四六：這些口號在人民日報社論中透露，見「天安門精神萬歲」（社論），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

註四七：余子道、丁榮生，「生動激地對大學生進行四項基本原則教育」，文匯報，（上海），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註四五：先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

註四六：「貫徹六中全會精神加強和改善學校思想教育」（社論），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註四七：思想戰線座談會」，中共原始資料選輯，（臺北，中共研究雜

誌社，民國七十年），頁五八二。

註四八：同註三九，頁五。

註四九：「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武器」，工人日報，一九八一年八月五日。

註五〇：中國大陸民主運動人士路林說：「馬克思主義也可能是真理，但是看一看馬克思主義指導在中國社會及現實及給中國大部份所帶給的『幸福生活』，就應該明瞭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危機了。」

註五一：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在理論工作會議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他又在「目前形勢和任務」中透露大陸人民的心聲。

註五二：人民日報（社論），一九八二年八月十日。

註五三：同上，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註五四：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註四五：刑賁思，「信任危機」，工人日報，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日。

註五六：王任重，「共產主義要堅持共產主義，克服個人主義」，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

註五七：人民日報評論員，「做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四日。

註五八：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

註五九：魏金山，同上，輯一，頁七。

註六〇：崔俊澤、覃北定，「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官僚主義」，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一九八四年四月，頁二十六。

註六一：何煉成，「政府經濟學理論和我國社會主義實踐」，西北大學學報。一九八四年第三期頁六。

註六二：同上。

註六三：于光遠，「開展馬克思主義，政法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歷史研究」，學術月刊，一九八三年十月，頁一。

註六四：同上。

註六五：同上。

註六六：廖昌源，「生產經濟學與政法經濟學」，學術月刊，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頁六一八。

註六七：同上。

註六八：熊映梧，「『資本論』的歷史局限性」爭鳴（香港），一九八五年九月，頁二十一—二十二。

註六九：同上，頁二十三。

註七〇：同上，頁二十一。

註七一：同上。

註七二：馬丁，「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工人日報，工人日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日。

註七三：同上。

註七四：同上。

註七五：同上。

註七六：同上。

註七七：同上。

註七八：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

註七九：光明日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註八〇：光明日報，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

註八一：大陸學者張維平、伍曉鷹以對話的方式，在北京「讀書」雜誌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制，藉此對中共社會主義實踐，作了嚴厲的批判，如最近「經濟自由主義潮的對話」，讀書一九八六年十月，頁十十九。

註八二：張顯揚、王貴秀，「針對新的實際，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

註八三：人民日報評論員，「理論與實際」，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七日。

註八四：宋長瑞，「經濟體制改革與共產主義之理想」，理想教育（山西太原），一九八六年五月，頁二。

註八五：同上，頁。

註八六：馬洪，「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時期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任務」，社會科學月刊，一九八四年一月頁二。

註八七：同上。

註八八：同上。

註八九：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十二月七日。

註九〇：同上。